

“少数”之历史与总体的观照

——近年广西少数民族长篇小说概览

□曾攀

从文学发展史看，好的小说往往能够形成一种文化的界碑，确认历史深处与现实境况的精神坐标；而充满异质性的小说则指向的是那个独特的“界标”，那通常喻示着富于辨识度的美学调性和意义靶向。综观近年来广西少数民族长篇小说的创作，其在历史性与现实性、民族性与边地性，以及心性和人性等层面，都进行了多重维度的探索，形成虚构之力，冲破边界，以构筑主体性的基石。这些小说，或经由少数民族之精神景观，参照民族历史与家国历史的精神谱系，在独异性较强的内部逻辑中，同时灌注着总体性的文化依托和意义系统。

无论是田耳的长篇小说《秘要》对焦特定历史及其文化场域，还是黄佩华《花甲之年》显露出来的当代中国的精神症结；无论是光盘的《烟雨漫漓江》中悠悠漓水之畔矢志不移的南方新人，还是杨文升《神山》曲折离奇的苗族史诗，这些小说呈示出来的所谓“少数”之成长史、家族史、情感史，颇具奇崛腔调或边地元素，在独异性较强的内部逻辑中，同时灌注着总体性的文化依托和意义系统。

二

田耳的长篇小说《秘要》中洋溢着隐秘世界的话语交响，那些虚构之力与现实人心同频共振，对应着整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精神症候。小说里，一面是呼啸而至的宏阔历史，一面是浑幽幽深的武侠江湖，且不仅仅是江湖，而是另一重有待揭示的生命与生机。虚构与纪实，民间与正统，历史粗粝的部位凸显显现，褶皱之中尽是嗜哑的奔涌。这样的小说或可使我们跃离世俗世界，潜入深邃而神秘的领地，激扬风潮、指点江山，似虚若真、无有阻隔。《秘要》中的江湖自然分化为不同的价值系统，却又并非封闭的所在。小说既有黑话的暗涌，也有明面的流动，不同话语交织其中，合法的与非法的，纸上的与史实的，“我”在其中见证了“黑书”交错杂糅的生成史和流转变，在那个边缘的世界也自有整全的体系。“收藏两字，涵涉面广”，“高端玩家”如纪叔棠等满世界倒腾天价藏品，“斗小民有几个闲钱也要聚物聚宝，要用平等的目光，不说也要收藏家，但说就在搞收藏”，虚写的《天蚕秘要》也好，纪实的如《忆旧觉迷录》也罢，都映照着的另一维度的精神状况。小说最后，“我”与纪叔棠流连台北街头，世事茫茫，何处相逢。小说写黑书界的玩法生态，触及了江湖之中难以度量的游戏及游戏规则，韦伯提出现代世界中的科学化、理性化，每一个行当都有彼此的规约、定

律，而田耳恰恰写出了高度理性背后极富意味的潜话语、潜规则以及潜世界的存在，加之人际与人心的复杂幽深，便形成江湖之水深且浑浊的缘由。

田耳是个讲故事的好手，《秘要》亦试图往传奇的方向走，写出奇崛和奇诡。与之相关的，则是对悬念的营造与追逐，特别是写武侠小说作者的转化、再生或悬置，写玄之又玄的武侠与江湖，那里刀光剑影，那里柔情万丈，但又不乏理性的收束，小说里，藏家和论家怎样发掘和研究高沧，“只差找到《天蚕秘要》让整条证据链闭环。说白了，只要找到《天蚕秘要》，才能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而对于高沧的探秘也成了叙事之旨“要”，从高沧一路讲下来，纷繁庞杂的黑书界体系在“秘要”的解锁下豁然开朗。这亦是田耳的腔调所在，叙述仿如脱缰的野马，但是人物行迹所遗以及故事磅礴倾泻之处，回过头来看往往草蛇灰线，背后牵引着一个小说家的章法和格调。

《秘要》也是一本寻觅之书，围绕着对第一缺本《天蚕秘要》的探寻，如寻宝探险之旅般曲折幽邃。“小说里的武侠黑书，有一部分乃真小说，只不过假之名，寻求利益的最大化，没有抄袭，盗用的是金庸、梁羽生等大家之名，为的是贴个标签，卖个好价。”田耳的叙事充盈着引人入胜的术语、术语，遍及印刷技术、黑书知识，这是知识生产与小说叙述的一种范本，总体性的系统建构于焉塑成，一个个“黑色”而丰富的圈层不断游荡开来。武侠小说是类型写作，加之黑书市场所代表的“机械复制时代”的文化生产，仿佛一切都无足道也，但有趣味的地方，就在于秘密的追寻与神话的制造，从不为人知的制作工艺，到讳莫如深的藏家眼光，再到武侠小说生产的源与流、真与伪、道与术，构成了小说《秘要》的筋骨和精髓。不得不说，《秘要》使我们意识到，任何一个世界都是我们身处的世界，那里的人们，那里的生活，以及那里所构筑而成的交相辉映的活法，都与我们心神合契，我们得以从好的虚构之核中汲取元素，从被遮蔽的背面世界中回返自我，也于多元话语的回响里探询生活的景象，如此或许便是小说鼓荡人心的“秘要”。

三

当代小说直接触及老年生活的题材并不多，黄佩华的长篇小说《花甲之年》也

许能够为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当代中国提供某种想象性的映射。这部作品主要写的是高校机关退休老人马达华的内心困境及其纾解过程。马达华是西塘大学工会常务副主席，退休之后由城市返乡，由此展现了南方的驮娘河和赤水河流域的风俗人情、物事历史以及天地自然。与此同时，在不断地看见、经验与体悟中，马达华重新理解了那个原生“自我”塑成的地域，有意味之处更在于，那里再一次给予刚刚步入退休状态、处于精神分界线的“我”新的养分，也缓缓展开了一个当代主体行变的心理图示。

值得一提的是，黄佩华在通常意义上的城乡叙事中，别出心裁地掺入了如西林教案等在内的历史史实，以牵引人物的成长过程和家族生态，从而使得小说既是写主体重新觉知的个人史，当代中国乡土的演变史，同时也对应着20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史。可以说，叙事者通过深入乡土中国的腹地，在纵横两个层面展开了现实历史的深沉和广阔。事实上，对于衰老与死亡的恐惧几乎是人与生俱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年龄衰颓与肉身衰退带来的内在困境，与此同时，如何处置于体制与系统断裂后形成的精神真空，成为老年人甚或当代人面临的必要课题。小说中，马达华的退休生活以返乡为开端，随后开始了新的乡土见闻，故乡成为他的精神原点，同时也是离休之后新的起点。其中的启示便在于如何寻找精神的来处与归处，返璞归真地面对自我的不变与蜕变；在情感的源起与扭结之处——如马达华于故乡与乡邻里建立新的关联——重建精神的维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后，开辟新的价值序列以践行和探索未明之自我；增长实践意志，以有所为的姿态再次出发或停驻，开掘新的生命生长点。

四

光盘的长篇小说《烟雨漫漓江》仿佛娓娓道来漓江边的家事。在漓江源头的猫儿山腹地，那是漓江的上游区域，有一支由民间自发组建的巡山队，队长叫明灯。这支巡山队伍极富责任感，不计报酬地守护着绵延千里的山水漓江。小说构筑了一种实践者和行动者的形象，他们背后肩负着不凡的使命，同时又不得不去纾解现实与情感的困境，怀抱着对家乡和自然的崇敬，克服了诸多艰难险阻，甚至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

依旧表现出大公无私与大无畏的精神。

小说以满怀深情的笔墨，书写了“南方之南”的山清水秀，那里人情醇美如桃花源一般，“绿水青山”之中，他们四处宣讲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身体力行之。因而其中掩映着的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此过程中，南方的“新人”形象呼之欲出。他们兼具现实主义与理想情怀，既以无上的热情庇护一方水土，同时又以公正无私的面貌处置不公与黑暗。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从严惩治野生动物的偷猎者，拒绝打香楠树主意的外来者，到保护野黑山羊、驱逐生态环境破坏者，等等，他们在危急关头或利益当前始终不忘坚守立场，譬如明灯以及技术员赵国田和家人种植并保护香楠树，包括摄影家王云伟对乡土自然尤其香楠树的热爱，在日本人出的“大价钱”面前，严词拒绝。在漓江流经之处，人心向上、向善，人们心存牵挂又无惧无忧，于老少边穷之地抛头颅洒热血，又在优美之地促成成长谋发展，映现着一代人以及“南方以南”不屈不挠的“一地人”的精神图谱。

小说最后部分是所谓的“新乡土叙事”，倾向于表述新时代之中国乡土的实践与发展，在脱贫攻坚的号召下，江洞村整体搬迁，一方面出于紧迫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善生活、促进生产，如腾出地方种植珍贵的香楠树等。而此前意欲收购香楠树的日本人山本转而投资建造香楠木手串加工厂，“原料由江东村供应，工人由他的技术员和江东村村民组成”。这一切都在爱树敬树的前提下进行，科学砍伐合理利用，发展经济造福于民。小说最后，漓江烟雨漫漫，一切都孕育着新生与新变。

五

苗族作家杨文升的长篇小说《神山》，以桂黔边界一个叫“挂帘姬”的苗族村庄为书写中心，叙述时间以20世纪初期的1912年辛亥革命前后为开端，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主要书写的是苗族人民的历史抗争与精神成长，以及他们的族群纷争、爱恨情仇、家国观念，等等。从祖父允诺、祖母包诺和父亲允本来到南方的边陲之地，便开启了属于允氏家族的时代，也见证了现代中国的大历史变迁。

小说通过允氏家族几代人的故事，塑造了现代中国的“少数”之族群的悲剧英雄形象。以允氏父兄为中心，辐射

了他们的妻子、子女、族人甚至敌人的人物群像，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中国重新叙写苗族的史诗，除了表达时代历史之重要变动，追述少数民族的跌宕沉浮，小说描绘了以苗王及其族人为代表的精神气概。他们于生死存亡之际的生命抉择，以及他们性情的豪放坚韧，对于情感的矢志不渝，都能够体现出他们的精神意志中留存着南方边地奔涌突进的奇崛伟力。

除此之外，苗族的跳坡节、苗地盛行的斗牛之风，以及苗族人民对于苞谷甚至于天地自然的那份独特情感，都使得整个小说充满了异质性。而所谓之“神山”，则意味着苗族人民的神圣领地以及他们对于自己脚下的土地的膜拜和崇敬，也代表着他们所敬重的山川江海，小说中的野猪岭、冷水江、难爱沟等，都成为如神人驻的界域所在。苗民与“神山”生死相依，不离不弃。

《神山》深具自我之成长以及家族之行变的诗特质，既是以苗王允诺等人为代表个体奋斗的史诗，也是苗族人民的生命史与奋斗史；既是边地自然世界周而复始的轮回行变，同时又凸显了近现代以来中国改天换地的革命历史；既是少数民族进入新生活的感情前史以及伦理建构史，亦是一部野气横生且气势磅礴的南方史诗。

结语

综观当前广西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创作，在文化探询、地方书写、思想写作以及史诗观念上，都展开了新的想象，寻获了新的突破。首先也许可以以之理解为一种“新寻根写作”，其自然有别于新时期的“寻根文学”，文化的“根”并非一成不变，而恰恰相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显示其多样化、多元化，旨在激活在地性的文化资源，形成创造性的少数民族文化生成装置，激荡出更多新的关于民族想象与精神想象的可能；其次是地方性书写层面的新探索，尤其在“新南方写作”的视阈中，可以见出小说在“新人”形象塑造、地方风物聚焦以及精神深度的刻画等层面，展开的新的观察维度与叙事向度；再次则体现出一种超越传统的思想性写作倾向，当前少数民族叙事超越了传统乡愁绪式的写作，更多地掺入了个人化的智性与思索，包括对于历史的观察、文化的反思以及精神主体的生成及行变，而不再是仅凭一腔热血，更多呈现出对生命和时间的形而上



《秘要》，田耳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3月

《花甲之年》，黄佩华著，广西民族出版社，2023年10月

《烟雨漫漓江》，光盘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2月

《神山》，杨文升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

素朴、感伤与理想的“地方”和“世界”

——《上岭恋人》《琴声悠扬》《春雷》读札

□杨辉

以浓重笔墨详述再咚咚仗破“大坑案”并反身探究家庭和自我等事关人之存在的根本问题之际，《回响》还宕开一笔，去写刘青与卜之兰“隐居”的埃里风景：“这是一片舒缓的山谷，一条清亮的小河从山脚流过，二十来户人家沿河错落有致地排开，家家户户都有耕地，在耕地的外围是大片枯黄的草坡，草坡上散落着星星点点的马匹和牛羊。沿着草坡往上是成片的森林，森林在西斜的阳光照射下五彩斑斓，在五彩斑斓的上方，是透明的蓝天和白得像棉絮一样的白云。鸡犬之声传来，三三两两的人在河边淘米、洗衣、担水，炊烟从各家房屋的顶次第腾起，像一条白色的飘带在风中摇曳。”此地山峻岭峻，疏密得当；亦有阡陌交通，鸡犬之声相闻，庶几近乎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风景。不独景色殊胜，人事也颇多“古意”——“传统伦理”得以保留并持续发挥其规范人心的作用，“就像大自然的自我净化”，埃里村“也在净化这里的每一个人”。《回响》对埃里虽仅惊鸿一瞥，却也打开了理解作品世界的重要路径。埃里的人事风景是素朴的，感伤的，在更高的意义上也是理想的。它包括了刘青和卜之兰的生活理想，或也包含着更为复杂的意义——将之视作“桃源”原型的现代“回响”亦无不如此。

叙述类如陶诗“人境”的埃里村及其特存开垦之“人事”风景，并非《回响》的重心。但通观全书，可知此处叙述并非“闲笔”，而是葆有精神和生活世界别样意义的独特“境界”。身在繁复多变的外部世界，种种消息纷繁杂沓，诸般境遇目不暇接，刘青、卜之兰甚至再咚咚皆有疲于奔命之感，偶然发现这一处绝妙的所在，可以寄托身心之所，如何不教人心生欢喜，并乐意筑居于此。这个深具陶渊明诗中意趣的埃里，很有可能便是凡一平笔下的上岭，赵先平书中的瀑姆村抑或辽姑屯，远离尘嚣，文化底蕴深厚，自然风景优美。生活于其间的人物，亦如长居埃里的村民，他们恪守传统正道，无论时风如何来去，皆有源发于素朴情感的应世济物的方法，亦能感通天地万物的独特消息，并由之打开别样的精神和生活世界。埃里具体的生活肌理，在上岭，也在瀑姆村得到了细致的描绘。

上岭在何处？有实亦有虚。它是韦妹莲长期生活的实在空间，是侦探韦旗退休之后长居之所，是见证产婆韦美琴40余年荣光和耻辱的独特地方，是说客樊宝沙发挥话语的魅力从而改变各色人等生活和命运的所在，也是天赋异禀的裁缝樊加雨得超凡技艺并最终托身之所。在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里，上岭是实在的、稳固的，可触可摸，可得可见的所在。而在城里或者他乡，上岭便成为一些人的记忆和梦境，是形塑甚至仍然左右着他们的具体生活选择的精神中心。它是遥远的、虚幻的，却以其强大的文化和精神力量，成就和影响身居异乡的上岭人的生活。凡一平的上岭故事，因而包含着悠远的历史和文化，包含着浩荡时风的现实影响，包含着城与乡的分野与融合，包含着单纯的、素朴的心灵和情感的颇具诗意的感伤。不仅感时伤逝，亦有进退得失种种日常境遇牵绊所致的感伤。因有历史的、文化的深厚积淀，上岭人的思虑和情感选择与他处并不全然相同。凡一平写下了他们日常的困顿、具体的矛盾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上岭人的生活是素朴的、感伤的，同样也是理想的——有着朝向未来希望愿景的可能。它们是上岭作为“地方”的独异之处，是其山川地貌、风土人情之后更为重要的精神价值之所在。

细而言之，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且生活困顿的韦妹莲缘何拒绝常人眼中“泼天的富贵”？侦探韦旗为何刻意消解韦贵书随时可能爆发的仇恨？无法生养却有恩于上岭村及其周边的产婆韦美琴何以“却老”？擅长“墨闻”（劝说）的樊宝沙为何“巧言令色”“哄骗”他人？还有蒙冬花和樊山植不同的命运及其“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凤飞阿姨拒绝轻而易举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可以靠名字吃饭却又甘愿自食其力的包平安的



《上岭恋人》，凡一平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琴声悠扬》，赵先平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年5月



《春雷》，韦晓明著，北方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

人生选择，等等。这皆说明上岭村人精神的素朴和单纯。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中，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简单的应世之道并未式微，而是继续发挥其精神和心理的影响力。它让他们即便面临生活的困难、情感的痛苦，却因精神有所寄托而获得巨大的自我慰藉的力量。相较于书中偶现的代表另一种生活观念的人物，他们或许是渺小的，却秉有一种自内而外显发的生机和活力，自有他们生命不容忽视的价值和尊严。

《上岭恋人》中的故事，虽不乏生命的感伤甚或痛苦，却仍具精神向上的振奋力量。是为《黑夜里的歌王》中瓦姐拯救她孙女的方法及其意义所在。因为情感的失意和身体的病痛，瓦姐的孙女一度陷入巨大的绝望之中：“我在黑暗中绝望和挣扎，最后还是我的奶奶安慰我，鼓舞我，拯救了我。”即便瓦姐已逝，她为孙女打开的精神空间并不消隐，而是持续发挥其安妥人心的作用：“每当我悲伤、孤独，奶奶就会出现我心里，她的歌声就会在我脑子里回响。”瓦姐一生并不幸福，却因“歌唱”而获致精神的自我安慰。一如她年轻时的恋人，曾经于对歌传情的“歌圩”上一时风光无两，却在十余年的被遗忘、被冷落进而自暴自弃中偶然获得生活和情感剧变及意义所托：“一个大梦方觉的夜晚，他再次或重新来到曾经生龙活虎的旷野，

并在那里独唱了一夜的山歌，流了一夜的泪，这才释解解脱并振作起来。自此之后的每个夜晚，他都要来到这个承载着记忆及慰藉心情的旷野，呆坐、木立、踱步，然后唱歌。他对着周围的山唱，向着附近的草木和河流唱，唱了数百或许已经上千个夜晚。”终于有了“回应”，冷落多年的“歌圩”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他精神振奋，情难自抑，“歌从他的嗓眼里发出，飘逸、悠扬，像鸟从笼里放飞。黑夜里的他，舒畅、豁达，像彻底把鸟放飞的鸟笼。”那是他将毕生技艺传授给瓦姐的孙女之时和之后的感觉，也是他所在的村庄，所依凭的传统重现生机的可能。如歌王一般身怀绝技的乡间艺人，生逢其时，得以在下一代中传承他们的技艺。他们可以是瀑姆村的农先琴，因殊胜的机缘得窥技艺的至高境界。可以是婆婆，需要不断发现能够传承技艺的后辈人物。即便时移易易，彰显乡间深厚文化的传统的独特技艺的存续，仍需依赖乡里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返本”，也是“开新”，是因应时代新变所打开的更为开阔的，包含除旧布新意味的精神风景。

赵先平的《琴声悠扬》中收录的数篇作品，呈现的便是“地方”繁复、驳杂的“风景”。《硬头黄竹》中主人公的“平庸之恶”已足够令人触目惊心。《余地风波》叙述乡间类似“二流子”的无赖人物的生死同样叫人惊诧，《尘烟》中徐国荣

的命运遭际叫人唏嘘感叹，却也足以生发“果报不爽”的感怀，倒是《炭火燃烧》中的历史叙述，蕴含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不似前述诸篇中人物的颓然、茫然，乃是全书意味深长的向上之境。其中值得注意的当属《琴声悠扬》中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所呈现出的乡间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那些超越常伦的观念，如何形塑不同人物和他们的精神与技艺世界，在书中得到了颇为细致的描绘。这是理性所不及之处的灵性的阐发。它以其溢理性限度的灵性感知和表达世界的方式，感受乡间别样的生活世界。“我父亲从爷爷那里接过仙琴制作衣钵。爷爷那一辈在做好仙琴后十分讲究授琴的仪式。授琴需要天婆在天没亮就到山泉取来净水，摆上神台，画上神符，然后才能从琴师那里接过仙琴。”缘何如此，因为“仙琴在瀑姆村是至高无上的器物，它始终被摆放在不曾断过香火的的神台上，只有天婆在‘跳天’时才可使用”。正因为此，农先琴只会有一次高烧后获得将“一把仙琴弹得出神入化”的技艺，那瀑姆村年事已高的“天婆”婆婆婆看到高烧之后的农先琴脸色绯红，像喝醉了酒似的；农先琴有两个小时被仙姑附身，她舞之蹈之，身体像仙女一样轻盈；她口中念念有词，比唱歌还好听；她弹奏的仙琴美妙无比，已经达到物我两忘、琴人合一的境界……”此为灵性生发的重要时刻，似乎非有殊胜机缘而不能得。一场高烧使得农先琴获得了超凡的技艺，这技艺却也需要长开阔的，包含除旧布新意味的精神风景。

赵先平的《琴声悠扬》中收录的数篇作品，呈现的便是“地方”繁复、驳杂的“风景”。《硬头黄竹》中主人公的“平庸之恶”已足够令人触目惊心。《余地风波》叙述乡间类似“二流子”的无赖人物的生死同样叫人惊诧，《尘烟》中徐国荣

思考；再次则代表着一种新史诗写作的倾向，特别是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状况中，如何重述历史故事，如何表述革命史、民族史与现代史，实现诗与史的有机融合，以构筑真正的历史意识，以及在此过程中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总而言之，尽管“少数”显示的是那些可歌可泣、可爱可叹的点滴历史，却是从其中细密而精确的小切口里，但是却以见证宏大历史的变动向动，也对总体的社会精神状况多有观照，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富于历史感与想象力的文化图景。

（作者系《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

乡间世界平添无限意趣。它是“实境”之外的“虚境”，是唯有精神和现实双重意义上的创造方能开启的境界。

韦晓明的中短篇小说集《春雷》同样呈现出丰富复杂的精神样态，从《底流》《春雷》《当归》《空谷之上》《三江红》等作品，能够见出作者驾驭多样性题材的叙事探索。韦晓明以传统的现实主义姿态，同时探索新的话语形式，立足于南方以南，又能将思想的视阈拓展到整个中国甚至海外，把握不同类型的精神动向，并以此求索历史的变迁与时代的新声，由是传递出韦晓明关于人心与人性、道德与伦理、本土与世界的独特思考。

小说集《上岭恋人》《琴声悠扬》《春雷》中叙述和打开的“地方”，因之包含着传统和现代、城市与乡村、心灵世界和外部世界、理性和灵性交汇融合所成就的独特意味。其历史、文化、时代、现实及未来意义颇为丰富。此属“新乡土叙事”重要经验之一，既是传统的创化，亦是现实的创造。淡远中蕴含无限意味，素朴和感伤中包含朝向美好未来希望愿景的理想之境。一如这一日天色向晚，瀑姆村遂有叫人留恋的殊胜风景的复杂境趣的广阔意义：“此刻，傍晚来临，晒场边有两只母鸡咕咕地唤着它们的十几只鸡仔准备回笼，稍远处有一个农夫赶着几头牛急着回栏，但牛儿却不急，哞哞地叫了几声，是那种舒服的慵懒的声音。更远处，瀑姆村四周已经升起炊烟，散淡而悠远。西边的天空上，原本是浮着一层灰色的云层的，这一刻忽然裂开一道长长的缝隙，夕阳的余晖让这一道裂缝镶上了金边，乍一看像有一把长长的剑横在苍茫的大青山上空。”这风景如今仍在，在瀑姆村，埃里抑或上岭，在“人事”与“自然”共在的世界，它携带着历史和文化的浓重印记，拥有着向现实和未来希望愿景不断敞开的开放姿态，它容括着一代又一代人回望乡间时生发的精神意趣，也包含着身在乡间的数代人的记忆、情感和生活创造。它是一个个的“地方”，却并非“封闭”，也非“偏远”，而是在自己的世界的中心，同时映衬和表征着更为广阔的“世界”的重要面向，意味深长，生生不已。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